

# 慎言不苟——论儒释道的语言传播理论之儒家篇

陈雪军

**摘要：**“慎言”观是孔子最核心的语言传播理论，其“慎言不苟”的语言传播理论，是建立在其“名正言顺”的语言哲学基础上的。讷言敏行和谨言慎行是儒家语言传播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孔子一生历尽沧桑之后的经验之谈，更是孔子对于世人的肺腑之言。孔子的“慎言”观对中国古代的语言传播理论影响深远，对后世人们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也有久远的影响。慎言不苟、修辞立诚早已构成中国人的集体语言意识。

**关键词：**慎言不苟；儒家；语言传播理论

**作者简介：**陈雪军，男，副教授，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传媒与设计学院，浙江 宁波，315100）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4) 05-0026-07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杰出的语言大师和传播大师。在先秦语言传播理论的演变过程中，孔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尽管孔子的语言传播理论中没有涉及对语言学本体论的阐述，但是其对语言实际应用的技巧和语言在传播中的作用、功能作过系统和细致的讨论，这些正是孔子对语言传播理论的贡献。而有关“慎言”的理论是孔子最核心的语言传播理论，孔子之外的其他儒家人物也多有涉猎。本文试图以孔子为核心，梳理儒家“慎言不苟”的语言传播思想，以求正方家学者。

## 一、儒家“慎言”论的哲学基础和道德旨趣：名正言顺

如果说“道”与“言”的问题是道家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sup>①</sup>，那么，“名”与“实”的问题，则是儒家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儒家孔孟的语言传播理论正是建立在其“名正言顺”和名实相符的语言哲学之上的。对于“名”的解释，从字源上来说，据《说文》：“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韩东晖认为，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名、命相通，皆是“口中之称”；第二，冥而不明，无法指物以称（即进行实指定义），故需发声制“名”以达其指。因此，“名”之产生缘于“不明”，故鸣（发声）而命（命名）之以“指举”。名的本义应是“标明”。<sup>[1]</sup>《释名·释言语》：“名，明也，名实使分明也。”而名之所命、所明的则是“实”。据《说文》：实，富也。从宀贯，贯为货物。段玉裁注释说：以货物充于屋下为实。孔子一生都在为正名而努力，《春秋》就体现了他的正名思想。子路曾经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所谓“正名”，即指名实要相符而言，而孔子之“正名”思想正缘于当时的“名不正”（《论语·子张》），是鉴于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现象有感而发的。这段话是孔子在卫国说的，据说是针对特定事件而发的。据《史记·孔子世家》：“是时，卫公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卫君”即出公辄，其父蒯聩在卫灵公时立为世子，后因得罪灵公夫人南子而出亡。灵公去世后，依礼当继位，然辄拒而不纳。故孔子

① 详见拙文《说不可说，言不可言——论儒释道的语言传播理论之道家篇》。

说了这段话来表明自己的意见。“是时出公不父其父而祗其祖，名实紊乱矣，故孔子以正名为先。”<sup>[2]</sup>

由此可见，孔子“正名”说指的是与“君臣父子”相关的“名分观”。无论是为君为臣者，还是为父为子者，人们的言论和行为都要遵照“名分”规定的道德伦理规范，这样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才会井然有序，老百姓才不至于“无所措手足”。孔子和儒家的“正名观”其目的正是为了等贵贱、明是非和审治乱，正如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所云：“孔子的正名思想，事实上包括这两方面：一为‘正形名’的名实概念，一为‘正名分’的伦理规范意义。所谓正形名，主要属于自然、社会和一般事物的客观历史观察。所谓正名分，则是属于主观政治伦理方面的实践法则问题。前者是要做到立名言、别同异、明是非、辨真伪等等有关逻辑内容的‘事实判断’的认识。后者则是实行定名分、治纲纪、正理平治，以及明贵贱、别善恶等等以封建政治伦理为基础的‘价值判断’的问题。孔子的正名论，刚好概括了这两方面的问题，即统摄了名言事实关系和名分正理。”<sup>[3]</sup>

在孔子看来，名分、权利和义务是为政之大节。类似的例子，如：“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朱熹注释说：“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简，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盖当时失其制而不为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为觚也。”觚，相传是上古尧舜时代使用的酒器，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延续到了商周，原为朝廷和贵族专用。但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不再是朝廷和贵族的专利了，而且连形制都改变了。在孔子看来，这已经名不副实了，不能再称之为“觚”。

《韩诗外传》卷五中记载了一个孔子的故事：“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曰：‘自今以来，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故孔子正假马之名，而君臣之义定矣。《论语》曰：‘必也正名乎。’《诗》曰：‘无易由言，无曰苟矣。’”

在孔子看来，“假”这个字（名）与其蕴含的意义（实），同“取”这个字（名）与其蕴含的意义（实）显然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孔子以此来区分“君臣之义”的；或者说，孔子是想通过“正名”即正名辞之使用以规范君臣之间的差别。由此，孔子将“言”与“礼”联系起来了，他强调“非礼勿言”。在孔子看来，说与不说、说什么或怎样说，对于人的道德、行为和修养关系密切。孔子断言“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认为“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而且还将“言”与“行”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以光说不“行”（做事）为耻，而且耻于“言过其实”，耻于说得多做得少。循此，孔子认为，君子怕自己说到做不到，总是尽量寡言少语。因此，可以说，孔子“慎言不苟”的语言传播理论，正是建立在其名正言顺的语言哲学基础上的。

## 二、儒家“慎言”语言传播思想的历史渊源

《说文》：“慎者，谨也。从心真声。”杨伯峻《论语译注》说：“寡言叫做谨”。<sup>[4]</sup>《尔雅》又云：“慎者，诚也。”可见，慎言亦即谨言、诚言，指出语谨慎小心，符合主观内心体验，也符合外在的文化规范。其实，这种慎言的语言传播思想非自《论语》始，非自孔子始。追溯其根源，盖即肇始于周人。

首先，孔子“敏于事而慎于言”的思想，追溯其根源，即在于《周易》爻辞中所表现的矜慎内敛、克制自省的精神。对此，沈立岩认为：“周人浓重的忧患意识，严格的等级体制，完密的礼乐制度，是主张‘慎言’而强调‘有序’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它反映了宗周社会最基本的语言态度，亦是其文化精神的典型体现。”<sup>[5]</sup>如《艮》六五辞曰：“艮其辅，言有序，悔亡。”对此，王注云：“施止于辅，以处其中，故口无择言，能亡其悔也。”《周易折中》引龚焕云：“艮其辅，非不言也；言而有序，所以为‘艮’也。”宋俞琰《周易举要》云：“辅者，言之所自出。言妄发，则有悔，况言于艮止之时，能无悔乎？今曰艮其辅，则辅不妄动；言有序，则言不妄发，是以悔亡。六五柔得中而无过，故其象占如此。”<sup>[6]</sup>高亨认为《艮》六五辞的这段话直接影响了孔子的“慎言”思想：“《论语·为政篇》：‘多闻阙疑，慎言

其余,则寡尤。’言有序悔亡,即慎言之意。”<sup>[7]</sup>

其实,《易传》还多次直接地阐述了慎言思想,如《系辞下》:“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又《系辞上》:“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又《系辞下》:“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颐·象》:“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当然,《易传》关注的是言语不当而可能引起的灾祸,认为言语不当或致生死荣辱、功败垂成,故须慎言以避祸。

其次,孔子“敏于事而慎于言”的思想源自原始时代语言禁忌的影响。卡西尔认为:“变成禁忌物的危险是一种物理的危险,它完全超出了我们道德力量能达到的范围。不管是无意的行为还是有意的行为,其效果是完全一样的。禁忌的影响完全与人无关,并且是以一种纯被动的方式传播的。一般说来,一个禁忌物的意思是指某种碰不得的东西,是指一个不可轻率接近的东西,至于它的方式则是不考虑的。”<sup>[8]</sup> 原始人认为,某些涉及危险的字眼或神灵的名字,不能随便说出口,否则将会导致直接的物理效果。于是,与这种语言魔力信仰相关,语言禁忌随之产生。在《诗经》中,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原始时代语言禁忌的遗风,如《板》亦曰:“天之方懞,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孔疏:“尸谓祭时之尸,因为神像,故终祭不言。贤人君子则如尸不复言语,畏政故也。”与原始时代不同的是,这种禁忌已经由鬼神世界转移到了对神圣天命和大人君子(统治者)的敬畏。《诗经》中所在多有,如《诗经·小雅·雨无正》第三章:“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迈,则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是说君王为恶,不听善言,群臣不尽职责,不敢出言劝阻;又如第五章:“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指出在朝廷言语之难,忠直之士不敢说话,因为言语不是从口舌一发出就完了,自己的身体还要以此而遭困病。对此,沈立岩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慎言思想除了出于对神秘危险的恐惧外,“同时也源于对言语的道德内涵及其社会影响的关切,因为悖于道德戒律的言语所招致的,并不只是来自隐秘世界的莫名的危险,更有难以承受的现实的后果。这两种因素的结合,遂使周人的言语行为受到了宗教与社会的双重制约。”<sup>[9]</sup>

再次,孔子“敏于事而慎于言”的思想源自商周时期的典籍。追根溯源,“慎言”的语言传播思想可以上溯至商周之际。孔子“慎言”与他研读整理编删古文献有关。古文献中留下前人关于言辞的经验教训是相当丰富的。甲骨文中已经有这方面的刻辞,如“疾言,唯害”,<sup>[10]</sup> 殷人认为,急遽地说一些轻率而不合理的话,容易带来危害,由此可知当时人们对语言普遍持谨慎的态度,提醒人们要思而后言,切不可放言,更不可肆意妄言。《逸周书·小开解》也有类似的记载:“汝夜何修非躬,何慎非言,何择非德?呜呼,敬之哉。”周文王比较重视天象,有一次发生了日食,他认为可能不利于国家社稷,据此他训诫自己的臣子言语要慎重。

《尚书》、《周易》等先秦经典著作都对孔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些经验之谈会给孔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孔子是非常重视这些古文献的,把它们当作经典看待,他当然会铭记这些古文献中有关“慎言”、“巧言”的教导,在语言实践中也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由此可见,孔子慎言传播观的渊源十分古老,孔子博览群书,通晓前人的史料文献,他正是从这些零星的慎言思想中,最终总结出自己完整的慎言传播理论。

### 三、慎言语言传播方法论

“慎”,自先秦以来,即有“慎重”和“谨慎”二义。前者如《吕氏春秋·节丧》:“慈亲,孝子之所慎也。”高诱注云:“慎,重也。”后者据《说文·心部》:“慎,谨也。”慎从心,故在心为慎;谨从言,故发言须谨。而言语之谨慎,实即出于对语言的重视;反过来说,对语言的谨慎自然也是重言的题中之意。所以,我们认为,儒家的慎言观实际上是重言观与谨言观的统一,而侧重于谨言。故“慎言”也就是

在语言传播活动中应该做到出言小心谨慎。在孔子看来，这种言语行为的谨慎，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言语传播者的言语传播行为要小心谨慎，即怎么说要谨慎。一是言语传播者对所传播的言语内容要小心谨慎，即说什么要谨慎。

### （一）言语传播者的言语传播行为要小心谨慎

一个言语传播行为涉及到人际传播的方方面面，要考虑传播环境的各种要素，所以必须小心谨慎。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言语传播行为所涉及的各个环境要素，可以统称为语境。语境对于言语者的表达和听者的理解都是极其重要的。对此，语义学、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理论等学科都有深入研究和探讨。一般认为语境包括言内语境（co-text）（即言语交际过程中的上下文）和言外语境（extra-linguistic context）（即一系列与言语交际密切相关的语言外因素）。言外语境大致说来包括情景语境和社会语境两大部分。对于言语者的言语表达来说，交际和现代言语传播理论认为言语者应充分考虑交际语境的各种因素，要努力使自己的言语表达得体，要切合语境。对此，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深刻认识和阐释。

先谈言语的情景语境。言语的情景语境包括言语交际的主题、言语交际的时空场合以及参与言语交际的各方等因素，细究起来，主要由五个要素构成，即何时（时间）、何地（地点与场合）、何事（话题）、何故（交际意图）、何人（交际双方，包括双方的身份、职业、兴趣、情感、思想、信念、意志、个性、气质、能力、修养等），可以简称为“五何”。换言之，言语交际的双方是什么人（何人），他们在什么时间（何时）、什么地点与场合（何地），因为什么事情进行交谈（何事），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何故），构成了言语交际中的情景语境。<sup>[1]</sup>孔子一向注重言语传播中的情景语境，常常根据现实生活或场合的不同，对言语作相应的调整。这一点，从他的言语传播实践中就不难看出他对言语情景语境的重视，他说：“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闕。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蹶蹶如也。”（《论语·乡党》）这正是孔子在言语交际中自觉遵守言语交际的时空场合约束、在不同的言语传播的情景语境中，采取相应言语行为的结果，由此可见孔子是认同和践履着言语传播必须契合言语的情景语境的观点。

言语传播是一种言语传播双方思想、感情的交流和沟通活动，要与言语传播的对象相适应，做到因人制宜，言说者的言语只有通过听话者的聆听、接受，才能产生影响和作用，才能最终完成一个完整的言语交际过程。孔子认为交际双方共存共变，言语交际要对对象有充分的了解，要针对对象来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并能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言语传播方式：“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诃诃如也。君在，蹶蹶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根据不同的交际对象而自觉进行言语调整，根据不同对象的身份来调整言语交际的方式。由此不难看出，孔子在言语传播中擅长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以及言语交际对象的不同，来确定自己的容貌表情（即副语言），来选择自己的言辞，或者说孔子在言语交际场合非常注意容貌表情和言辞的得体。对此，孟子也有类似的论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说话不能随便，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要把握“可以言”和“未可以言”的分寸。另外，他也十分注意选择言语交际的对象，告诫人们“不与恶人言”（《孟子·公孙丑上》）；他还一再强调言语要符合言语者自己的身份，不能“位卑而言高”（《孟子·万章下》）。总之，跟孔子一样，是主张“慎言”敏行的。

再谈社会语境。社会语境主要由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要素构成，也就是说，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社会背景构成了言语交际中的社会语境。在孔子所处的时代，社会语境主要是言语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孔子在言语交际时，已经开始关注交际言语与言语者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关系，并作出自己的调整：“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



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孔子认为国家太平、政治清明时,言语和行为都可以正直;国家动荡、政治不清明时,行为仍然可以正直,但言语却要谨慎。如果不顾政治环境的变化,言语不谨慎,信口开河,甚至胡言乱语,就不仅对国家有害,甚至也会危及自身。对此,宦懋庸《论语稽》解释说:“邦无道,则当留有用之身匡济时变,故举动虽不可苟,而要不宜高谈以招祸也。汉之党锢、宋之元佑党、明之东林党,皆邦无道而言不逊者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举汉明之末的例子说:“汉明之末,学者知崇气节,而持之过激,酿为党祸,毋亦昧于远害之旨哉!”综上可知,对言语传播环境与政治环境相互影响的关系,孔子的认识已深中肯綮,入木三分。

## (二) 言语传播者对所传播的言语内容要小心谨慎

### 1. 非礼勿言

对于言语传播的内容,孔子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认为言语传播的内容应符合“礼”的要求,主张“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论语·颜渊》)。“非礼勿言”,反映的是言语传播内容“合礼”的要求,所指向的是一种极高的道德约束力,是对人们言说内容的刚性的道德约束。实际上它所涉及的是“言”与“德”的关系,这也是儒家语言哲学探索的基本问题。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孟子则把言语与“心”联系起来,孟子认为,言语是人们性格、性情的表现,不同性格、性情的人,其使用的言语也就不同:“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孟子·公孙丑》上)即我们可以从言语直接体察出人内在的道德状况。所以孟子主张“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下》),排斥邪说淫辞,认为一切言语正如一切行为一样,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礼义的要求。总之反映了孔孟语言传播思想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与伦理学色彩。

到了汉代,对于“言”与“德”的关系,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礼记·曲礼上》)在汉儒家眼里,人和禽兽都能发音,但人的言语传播内容要符合“礼”的要求,这是人言与鸟兽之音最根本的差异。而且,人们的言语也是人们道德的重要表现:“言谈者,仁之文。”(《礼记·儒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记·曲礼上》)因此,汉儒自然也就把言语看作是修德的重要内容:“且凡士之所以为贤者,且以其言与行也。”(王符《潜夫论·贤难》)甚至认为言语与安邦治国联系在一起:“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刘向《说苑·善说》)

### 2. “修辞立其诚”和“言必信”

这里,“辞”与“言”可以视为同义。在先秦文献中,“辞”、“言”、“说”经常错综使用,显然“辞”有言辞、话语、言说之意。“修辞立其诚”中的“辞”指表义完整的话语篇章,兼涉言辞和文辞。“诚”与“信”,义亦相近。在“真实无妄”、“诚实不欺”两个义项上,“诚”与“信”可以互训:“诚”即是“信”,“信”即是“诚”。“诚”,《说文解字》曰:“诚,信也。从言成声。”又云:“信,诚也。从人言。”段玉裁注曰:“人言则无不信,故从人言。”《尔雅·释诂》:“诚,信也。”王揖《句读》:“言者,心之声也。”“诚”、“信”皆从“言”,而言为心声,由此可知,“诚”的本义是“忠于心”的诚实守信。心诚源于客观事实的真,“诚”又指说出来的话信实无欺,信实、真实。<sup>[12]</sup>孔子并没有直接谈到诚,而多次谈及信和忠信,它们在孔子言语中是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出现的,其主要含义有:(1)言说真实无妄,重然诺;(2)做事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既不自欺亦不欺人;(3)一般的道德要求,指诚实不欺,让人相信、信赖等。<sup>[13]</sup>孔子非常重视建立这样一种“言必信”的信任关系:“民无信不立”(《论语·先进》)、“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雍出》)。这里的“信”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话诚实守信,二是只有自己言而有信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也就是说“信”是一种双向的信任关系。

孟子在孔子“诚、信”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语言的真实无妄，他说：“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言语的内容要充实和真实，这点与现代西方著名的语言学家格莱斯（Grice）的观点相似。格莱斯在其《逻辑与会话》中提出了人们在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其中前两条即是量的准则与质的准则：量的准则要求尽量提供对方所需信息，不提供冗余、无用的信息；质的准则要求只讲真实的话。由此可知，孟子这里提出“实”的标准，与格莱斯所阐述的“合作原则”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和相通的。孟子认为，成功的言语交际应是质与量高度统一的典范，同时还应该符合道德和伦理的标准，要“真实无妄”，要做到“语言必信”（《孟子·尽心下》）。在言语传播中，这两条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故孟子主张慎言。孟子云：“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孟子·离娄上》）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轻易地对待自己说出的话，做不到言行一致，是因为失言之后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实际上是孔子“讷于言，慎于行”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 四、慎言论的现代启示和影响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语言传播思想的慎言论，其对后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人际传播模式，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凝练和形成，塑造了朴实诚信、奋发有为的独特民族个性。可以说，无论是“言出如山”、“君子无戏言”的格言谚语，还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人格砥砺，其所受儒家“慎言不苟”传播思想影响之印记，都是处处可见，难以磨灭的。慎言绝不是不言和少言，而是谨慎地言说。由此，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慎言的观念和方法，比如：讷言敏行的言行观，言必信、修辞立诚的信言观，时然后言的语境观，对于我们当下的人际传播和为人处世之道仍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启迪。

讷言敏行和谨言慎行是儒家语言传播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孔子一生历尽沧桑之后的经验之谈，更是孔子对于世人的肺腑之言。尽管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与孔子的时代迥然不同，但儒家对于言语传播谨慎的态度仍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倡导。儒家的讷言谨言观，时刻提醒着人们要注意自己言语所可能引发的后果，要善于选择适当的言语，尽量少说，甚至不说；慎行观，则要求人们遇事要头脑冷静、用心思考，懂得事情的轻重缓急，谨慎从事。儒家的言行观于今天仍有启迪意义，它告诫当今的人们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当今社会，各种交往、交际活动日益频繁，大自国家、集体的交往互动，小至个人的日常交际相处，越来越离不开交往、交流、对话、沟通活动，以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风行世界。口头语言表达（言）是交往、交际的最主要手段，社会各界、各色人等，都普遍重视和培养自己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演讲能力。但是言与行是一对相对立的范畴，如果片面地强调语言表达，就可能导致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就会走向反面，即弱化了行，冲淡了实践的意义。所以，我们不应该刻意地去追求言语的技巧和语言的华丽等，而应注重于提高自己内在的道德修养与文化知识水平。

信言观是指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言语要诚信，要“言必信”，要“修辞立诚”。孔子多次谈及信和忠信，孔子认为言语传播的内容要真实，要言出必行；做事要严谨踏实，一丝不苟，既不自欺，亦不欺人，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民无信不立”（《论语·先进》），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雍出》）。在当下，社会上存在不少骗人、害人者，他们为了一己私利，常常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导致整个社会缺乏诚信，人人自危。孔子强调人们言出必行和谨言敏行，对于规范当前人们的言行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然而，从“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政治传播观来看，儒家认为言语传播事关国家的兴旺、衰败，因此帝王要谨言慎行，臣子和百姓更不能肆意放言，由此，语言传播受到极端重视，而极端重视却容易导向言论专制。而我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帝王拥有绝对无约束的权力，统治者通过儒家的礼仪和等级秩序对国民形成有效的政治控制和言论控制。对臣民的言论和思想控制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一直

没有停止,历代不乏因言获罪者,特别是清代造成了“万马齐喑”的现象,这使国人在语言传播活动中自然会十分谨慎,儒家“慎言”传播思想就自然成为指导国人的语言传播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不二法宝。因此可以说,在极权统治和高压政治的作用下,儒家的“慎言”思想往往导致了人们普遍的“无言”和不敢言。

总之,“慎言”传播思想的实质是通过儒家思想来制约人们的言语传播行为,其消极作用不容忽视。“慎言”容易导致人们思想趋于封闭、保守,从而阻碍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言语交流;“慎言”也容易影响人们参与舆论监督的积极性,使人们采取明哲保身、独善其身的言语交际策略。当然,“慎言”传播理论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提高言语传播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修养,对于营造良好的传播氛围和社会风气,均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止于至善”的传播价值观也有助于国家的和谐、稳定发展。此外,讷言敏行的言行观,言必信、修辞立诚的信言观,时然后言的语境观,对于我们当下的人际传播和为人处世之道仍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启迪。

#### 参考文献:

- [1] 韩东晖. 先秦时期的语言哲学问题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5): 61.
- [2]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7: 93-94.
- [3] 汪奠基. 中国逻辑思想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124.
- [4]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5.
- [5] 沈立岩. 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157.
- [6] 俞琰. 周易集说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81.
- [7] 高亨. 周易古经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313.
- [8] 卡西尔. 人论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136-137.
- [9] 沈立岩. 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158.
- [10] 郭沫若等. 甲骨文合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440.
- [11] 黎千驹. 孔子的言语交际观研究 [J]. 毕节学院学报, 2012 (6): 4.
- [12] 丁秀菊. 修辞立其诚的语义学诠释 [J]. 周易研究, 2007 (1): 28.
- [13] 李现臣. 《论语》中的“诚”与“信” [J]. 孔子研究, 2013 (4): 123.